

心向往集

陈克 著

献给天津博物馆成立九十周年



天津古籍出版社

心 向 往 集

——献给天津博物馆成立九十周年

陈 克/著

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向往集: 献给天津博物馆成立九十周年/陈克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696-574-0

I. 心… II. 陈… III. 博物馆 — 工作 — 天津市 — 文集

IV. G269.272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1549号

心 向 往 集
献给天津博物馆成立九十周年

陈克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5 字数 430千字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80696-574-0

定 价: 75.00元

序

这部书是陈克智慧的记录。人都是随着历史潮流涌动而前进,根据客观环境规划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历史的。1977年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前夕,震撼社会的一件大事是恢复高考。有远大志向求知若渴并有所准备的青年,获得这一绝佳时机,他们相信有学问有能力,才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于是一大批人选择了投考大学,再造自己的人生路,勇猛地走下去。陈克即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份子,他的兴趣是历史专业,目标是进入南开大学,他的愿望实现了,成为被称为“老三届”(即1977、1978、1979届)的大学生。

这批学生有人工作多年,有人下乡多年,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读起历史来多能触类旁通,有“允公允能”的教诲和教师的引导,努力奋进,潜心学习,进益相当迅猛,特别表现在思想解放及放眼世界上。陈克是年级中的佼佼者,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英文和国学基础扎实,每每受到大家的称赞。

从毕业到现在30多年,陈克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行政领导岗位上都展现了他的才华。

最初,他分配到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共天津党史,后来逐渐转入天津地方历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理论传入中国形成高潮,他兴奋地发现,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许多方法可以借以开辟天津地方史研究的新领域,于是他利用自己英语专长,翻译发表了施坚雅等人的专著,得风气之先。随后,发表了若干城市史方面的论文,许多观点在当时有着拓荒的意义。他的《沿海城市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第二篇被当年《历史年鉴》重点介绍。他后来又参加民俗学家顾道馨

等人主持的《中华民俗小百科》和系列丛书项目,完成了《中国语言民俗》一书,显示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和史料功底。作品显现他的文化精神,其新知新见,跃然纸上。

陈克教授 30 多年来一直在博物馆这个园地中辛勤耕耘,这是他的兴趣所在。1995 年后他相继参与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博物馆的建设,又担任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令他有机遇充分发挥他另一方面的,即管理工作的才能。他工作认真,并有一种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这是成绩卓著的源泉。对他主持的天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华百年看天津》,于文物界有极高的评价。他对于相识们对自己画像:“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中成就有学术专家、商界骄子,也有政界精英。陈克是个复合型人才。”是认可的,我也认同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贴切的。

学海无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客观历史的现实是无限的。任何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向社会、向前辈,向同辈学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常青,可以超越自己的局限性。陈克今年是 60 岁,俗称一个甲子,就一个人的研究能力讲,这是学术上的成熟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希望他能再接再厉,完成他“心向往”的未了愿望。

魏宝运

目录

历史

- 3/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
- 7/1937 年以前天津工业人口之推算
- 16/近代天津经济功能的变化与城市发展
- 26/19 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
- 43/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
- 54/周学熙的实践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
- 61/天津与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
- 64/谈天津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
- 67/《中华百年看天津》序言
- 70/新天津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 79/沿海城市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 88/传统世界主义之扬弃
 - 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
- 97/晚清陆军转型中的淮军
- 104/《新军旧影》序言
- 107/《新军旧影》节录
 - 清末新军编练概况
- 112/天津的城与市
- 116/天津文化的依托
 - 城市经济

- 144/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标本
——三条石
- 146/天津的大王庙
- 148/中国铁路时代的开端
- 150/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及其建筑
- 154/溥仪“寓公”生活二三事
- 157/关于示威毅祠铁钟的几个问题

译 文

- 161/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社会控制
- 179/19 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 209/天津
——摘译自《香港、上海和其他中国口岸 20 世纪的印象》
- 233/殖民城市在毁灭吗？

博物馆学

- 249/博物馆的陈列设计要面向现代化
- 253/广义博物馆概念
- 260/博物馆的视野
——关于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与研究
- 265/传播理性
——天津博物馆事业的诞生及其社会功能
- 276/“中华百年看天津”陈列形式设计的原则与创意
- 279/天津博物馆事业的新发展
- 282/天津的艺术品市场与博物馆
- 286/回顾与思考
- 290/寓教于游
——博物馆的机遇与挑战

民俗学

- 295/妈祖崇拜与天津文化
- 298/妈祖文化的现代化
- 304/天津历史与天津人
- 308/庙会与花会
- 311/烟袋与烟文化
- 313/春节民俗漫谈
- 315/关于天津话

杂 文

- 323/学术研究方法与博物馆的实践
- 330/先进文化方向与中国文化遗产
- 335/关于天津文化的理论思考
- 340/顺直省委大事记
- 360/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启示
- 367/在探索中前进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顺直省委 1928 年 12 月扩大会议
- 375/走向统一
- 380/来自洛杉矶的乡情

历史

心向往集——献给天津博物馆成立九十周年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城市史，特别是近代城市研究领域。有志于城市史研究的不仅限于青年学者，很多成果卓著的老一辈专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近代城市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之一。

五六年以前，城市史还只是人们在学术会议上呼吁的题目，多数人认为城市史只是地方史的一个分支。随着国家社科“七五”规划把上海、重庆、武汉、天津近代城市研究列入国家重点课题，城市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每年有成百篇城市史论文完成，出版了《城市史研究》专业刊物，各大学历史系纷纷开设“城市史”专业课程，城市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学科的消长、兴衰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兴起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的。8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当时学术界围绕着如何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经济区的问题展开了多学科的讨论。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作了反思。鉴于我国大中城市大部分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沿海沿江城市，讨论中对近代城市的历史与评价多有涉及，如何深入研究、认识近代城市这个课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史学工作者的面前。1986年召开的“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是史学界介入城市讨论的开端。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集中于对近代沿海城市的发展作价值判断，如对租界的评价、现代化与殖民化的关系等等。各种观点的碰撞与共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近代城市研究的必要性。

80年代中期，学术界正面临着所谓“史学危机”。在近代史研究方面，传统的研究内容局限于专题，方法和理论上也已形成所谓“规范”，在寻找摆脱传统规范的种种努力中，近代城市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与传统的事实

史、斗争史相比,研究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在内容上是崭新的: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便于向其他学科借鉴。比如,无论是城市内部结构分析还是城市体系分析,采用系统论的方法是方便而自然的,而在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研究方面采用定量分析又是必不可少的。在理论上,经典作家并没有留下关于城市史的系统论述,因此每个研究者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层次重新构架城市理论体系。应当说 80 年代以来大量介绍到国内来的各种西方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宏观理论方面,对我国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概念经常为研究城市结构的文章所使用;施坚牙利用种地理论分析中国清末区域城市体系的模式,也启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路。

在短短的几年研究实践中,中国近代城市研究首先脱颖而出。1991 年 10 月底在天津召开的“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人们已经看到上海、重庆、武汉、天津四个国家重点课题如期完成的成果。同时,城市史是一门边缘学科,对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都敞开大门。在我国,由于社会学长期不发展等原因,近代城市史研究队伍中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的学者较多,事实上许多在城市搞地方史的学者也很快转到城市史方面来,此次会上,人们欣喜地看到,多学科的城市史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总要经历由浅入深的过程。近代城市研究是从对近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价值判断开始的。有人从经典语录的假设出发,强调近代城市发展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加以否定;另一种倾向则是纯客观地看待近代城市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大部分学者是持两点论态度的。问题很快转入对“现代化”的讨论,因为任何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都与“城市化”相关联。在国外,从 60 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一系列“现代化”讨论起,到 80 年代各国学者在日本取得较为一致的“现代化指标”止,讨论似乎已告一段落。而在我国,由于翻译习惯不同或是对内涵理解不同,出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并用的现象,概念不相通往往往使讨论中的对话困难重重。概念模糊的背后隐藏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理论的混乱。在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这一命中的歧义纷呈表现得最为明显,到底是把中国近代城市化理解为从封建城市演进呢?在“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把近代城市发展归因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人认为动力来自发生变化的内部,有人认为工业化是动力,有人说商品经济是动力,还有人把动力归纳为“多元动态”的。在讨论动力的同时,人们对近代城市的特征作了各种各样的描述: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化的,有人说是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有人从经济结构、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作了描述,有人则直接提出城市近代化的若干指标。这些讨论还远未达到共识,但是反映了学术界在研究

过程中寻找理论框架的强烈愿望。

在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另一个讨论重点是学科规范问题,包括城市史的内涵、研究内容、方法等,然而城市史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使建立规范并非易事。在“城市”概念问题上,有的学者从语源学的角度作了探讨,有的学者则试图对“城市”下一个全面综合的定义,结果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其实国外的定义已不下六七十种。也许人们最终也难以找到一种人人满意的结论,但是这种探讨大大有助于对城市史的理解。

寻找城市史与其他史学门类的区别也是一种界定方法。在“第二届近代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曾就城市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将城市史与地方史作了比较,并进一步对城市史作了界定。这种刻意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新学科的发展,并非贬低传统地方史志的意义。实际上大量界限不明的学术成果是不能轻而易举地与地方史区别开来的,即使已完成的国家重点课题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方法。相反,如果没有近年来广大史志队伍取得的丰硕成果,城市史研究是难以达到今天水准的。

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学者倾向于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这有助于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但也容易陷入思辨式的空论。现在的城市史研究不应停留在只谈论城市史是什么或是等待成熟的规范,而应当先搞出一批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成果来。目前最有可能出研究成果的有如下方面:

1. 宏观城市研究目前有两个方向,即区域城市研究和分类比较研究。就前者来说,天津社会科学院正在筹划对华北区域城市体系的研究,四川大学一亦制订了四川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计划,武汉社会科学院也有类似计划。“区域”时又一个棘手的概念,划分区域的参照系数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理的或是民族的等等,如何为区域中的一系列城市建立一种综合体系需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就后者来说,上海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上海、香港比较研究。如果仅就城市间某些相关特征进行比较的话,随意性较大,如国外有人作过的开普敦与天津的比较,还有人谈论过苏州与威尼斯的比较等等。如果为建立友好城市寻找根据,更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但是将两个城市作理论层次的理性比较则甚另外一回事。城市内部结构已经有数不清的变化参数,再加上与腹地的联系,客观上就决定了比较的案头工作更为复杂,工作量更大。但是这类课题的开展,将会大大提高我国城市史研究水平。

2. 近代城市文化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在我国,对于与乡村文化对立的普通意义上的城市文化研究还很少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考察其近代的变迁,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它包括作为城市文化载体的城市建筑的变迁、近代文化设施和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市民心态与风尚的变迁等等。在

城市文化个案研究中,把握具体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和实用价值。当前最有声势的是“海派文化”讨论。在现实生活中,史学家历来是城市文化保护的鼓吹者,在全世界,各国史学家都在扮演着各种短期行为反对者的角色。城市史学家应当为我国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先见之明与理论依据。

3. 近代城市社会研究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史的一部分。社会研究重在揭示群体与阶层的状况和关系,城市社会研究则要与城市发展相联系。近代城市社会是中国社会史中变化最剧烈的部分,因此不但要考察其历时性的变迁轨迹。笔者认为有两个方向应首先考虑,其一是近代城市社区研究。确定传统城市社区结构,然后再考察由于近代社会流动所造成的群体空间模式的变迁,这将使我们对近代城市的理解大大加深一步。其二为近代城市阶层与组织研究。即用相似的方法考察近代城市中纵向社会流动带来的阶层与组织的变迁。应当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感兴趣的是社会上层研究,而城市社会研究则应特别侧重于那些普通市民,即“历史上的默默无闻者”的状况。其实,整个城市史的研究特点就在于发展那些过去被忽视的,经过有洞察力的研究才变得明显的“潜在事件”。城市史新突破的意义也在于此。

城市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这意味着待开发的课题很多,而且每位研究者都得更新知识系统,没有规范,没有权威,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各抒己见,相得益彰。相信今后城市史一定会别开生面,日益走向成熟,成为历史学的重要门类之一。

(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1937 年以前天津工业人口之推算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迅速膨胀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到七七事变以前,天津已成为北方的工商业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工业在天津从无到有,形成以轻纺、化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天津的近代工业人口也从无到有,成为天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欲研究天津工业发展的历史乃至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不能不了解天津工业人口的历史状况。

工业人口是从事工业部门经济活动的全部人口。工业部门一般来说相当于第二产业,其范围包括制造业、电、水和建筑业,在旧中国的统计资料中,常将交通运输、邮电与近代工业一起算入“新式产业”部门。严格地讲,这部分产业应当属于第三产业,因此本文不将其算入工业部门。近代工业的特点是使一定数量的工人集中在一起使用大机器的生产。生产规模是相对的,不同历史时期近代工业的标准也不同。北洋军阀时期,有的统计以 2 人以上的工厂为准。1929 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新工厂法规定,凡使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之工厂,平时雇用 30 人以上者方得使用工厂法。以后的政府统计一般采用此标准,这可以看成当时近代工业的最低标准。尽管这一标准很低,当时天津仍有大量在此标准之下的小型工厂,不但人数少,设备也不完善,有的其实只算手工工场,生产关系不免带有封建性。可是从它们的产品看,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已纳入近代工业经济之中了,而且从统计数字中也无法将其剥离干净。为了不脱离历史,本文将从两种角度考察天津的工业人口,即符合近代工业最低标准的准工业人口和包括小型工厂在内的一般工业人口。上两项数字的考察是研究天津近代工业规模的很重要的部分。了解了这些数字即可推算出各时期依赖工业部门为生的泛工业人口,也就是包括工业部门职工所供养的家属在内的人口数(不考虑兼其他职业的情况)。通过各时期该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之比重的计算,就可以从城市人口的角度

考察天津市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天津最早的新式工业是官办北洋机器局,天津的工业人口也从此而产生。据记载,1868年天津机器局西局海光寺一处就有50名本地工人(《海关册》,1868年分册,天津,第16—17页),该局人数最多时东西两局共有2,700名工人(《津门杂记》)。1880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到1895年前曾有900名工人(《天津历史资料》九期第2页)。1895年以前,天津有外资工厂8家(《天津历史资料》19期),工人人数不清,从资本数看规模不大,如果按一厂30人计算,其总人数至少有二三百人。1895年以前,天津有两家民办工厂,贻来牟机器磨坊有30名工人(《近代工业史资料》一辑第1,200页),天津自来水厂有400名工人(同上)。根据上述统计,1895年以前,天津共有工人4,300人左右,这是天津最早的近代工业工人。

1895—1910年是天津工业发展的准备时期。经过八国联军的洗劫,天津的官办工业从此一蹶不振。这一时期的官办工业有大沽造船所、北洋银元局、北洋劝业铁工厂和实习工厂等,计有工人1,300人左右。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厂,也刺激了本国的官僚、商人、地主纷纷办厂,商办工厂开始在天津发展。1903年天津设立“直隶工艺局”之后,商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南洋劝业会调查,1905年天津新建的工厂有32家之多。1907—1908年间,直隶工艺局曾劝办十家纺织工厂和一家造胰厂。当时还有一批铁工厂,如1907年成立的孙恩吉工厂就曾有过100名工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64页)。到1911年时,天津有“二十家纺织厂、同样数目的肥皂厂与蜡烛厂、二十家卷烟厂、玻璃器皿厂与火柴厂,还有两家制革厂。还有许多小型的牙粉厂、香料厂、衬衣厂、袜子厂、罐头厂、炼乳厂、皮革制品厂与运动器械厂……”(《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算起来应有七八十家工厂,但大部分规模很小,其中稍大的只有几家,总人数不到一千人(见表一)。

表一

厂名	工人数	资料来源
北洋制皮公司	157	清国事情
天津造胰厂	38	工商半月刊三卷二十号
孙恩吉铁工厂	10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64页
北洋烟草厂	97	清国事情 1916年数
北洋火柴厂	54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649页

1895—1910年间,在天津新成立的外资工厂共有34家,其中资本超过十万元的只有6家,都是水电等公用方面的企业。这类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远高于其他行业,即同样资本含工人数要少得多。据1932年青岛中外工厂统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54—955页),同样资本的外国工厂比中国工厂工人数少一倍,同是外国工厂、同样资本的水电工厂的工人数仅为一般工厂的1/3左右。根据资本数估计,这几家企业工人数不超过1,000人。总计此期中外工厂的准工业工人数当在3,000人左右,其余近百家中外小型企业人数与此相当,可以推定当时一般工业工人数为6,000人左右。与前一时相比,官办工厂人数减少,民办和外资工业的比重增加了。

从1912年到1927年,天津工业开始起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天津的纺织业、化工业、制粉业、地毯业、机械印刷等工业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以轻纺、化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其中纺织业最为突出,占天津工业资本的70%左右(《天津志略》)。从1918年到1922年,著名的六大纱厂先后建成开工。到1928年时,六厂工人总数接近16,000,成为天津产业工人的基础(见表二)。

表二

年份	工人数	资料来源
1926	13,100	保工汇刊调查
1927	15,420	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
1928	15,986	天津棉鉴调查

除纱厂外,天津纺织业还有许多织布厂、针织厂、织染厂和地毯厂等。关于其工人数,有两种统计材料(见表三)。

表三

厂数	工人数	资料来源
22	3,667	1926年保工汇刊
34	1,517	1926年中外经济周刊

注:两种调查的选厂对象不同,前者百人以上工厂居多,后者百人以下工厂居多,基本不重复。

这两种调查的工人数加上六大纱厂的工人数共有准工业工人21,170人。保工汇刊的调查认为当时共有纺织工厂500多家,减去较大的工厂还应有450家。即便这些工厂都是不足30人的小厂,按20人一厂计算,至少应